

【論文】

“五四运动”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眼中的中国

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部教授 刘 柏林

要 旨

「五四運動」は、北京大学の学生を中心とする市民が 1919 年ヴェルサイユ条約の結果に不満を抱き、袁世凱政権の大隈重信内閣により出された対華 21 条要求を受諾したことに反対するために北京から中国全土に広がった学生運動であり、中国人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意識が高揚になったことを示すもので、その後の労働運動、農民運動など大衆運動の出発点となり、現代中国の史学界では、新民主主義革命の始まりとして位置づけている。

「五四運動」の翌年（1920 年）、上海同文書院は、「五四運動」の勃発により、一年間停止した慣例の中国大調査を復活させることになった。14 班に分かれた卒業前の第 16 期書院生は、中国の南は広東から北は東北まで 100 以上の調査点に足を踏み入れ、当時の中国社会の状況、イギリス人とアメリカ人の中国における経済活動、中国における綿の生産状況、華北地域における羊毛の生産状況、大運河兩岸と揚子江流域の商業、金融状況、広東周辺の金融状況、台湾の労働力状況、香港、広州の金融状況、上海における綿の加工と販売状況、上海の保険業、広州の通商状況などの慣例的な経済調査を行った。その外に、「五四運動」後、中国人の対日感情について調査を行った。書院生たちは、行く先々で地方官僚、教育界の人たち、商人、軍人、農民、女性と子供など、幅広く接触した。中国人の日本に対する反応を調べてきた。調査された人々は立場によって異なっているが、官民が書院生への対応に温度差が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両国の国民同士が日中親善を求める思いには変わりがないと伺える。

第 13 回旅行調査の結果は全 31 巻の報告書にまとめられたが、「“支那”内地における排日、排貨の状況」という調査報告書は第 31 巻となっている。全巻が 15 編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当時の中国人の対日感情について詳細に記されている。この報告書には 95 年前の日中関係を客観的に反映されており、中国近代史研究に欠かせない貴重な歴史資料となっている。95 年前の日中関係を観察して、今日の日中両国の関係の改善に何かヒントが得られるかと思われる。

摘 要

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与邻国日本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五四运动”后，日本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关注度不言而喻。“五四运动”后的第一年（1920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立即恢复了因“五四运动”爆发而中断了一年的中国踏查。书院组织应届毕业生（第16期），开展在华第13次大旅行调查。此次调查分成14个调查班，先后踏查了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一百多个市、县、村。把耳闻目睹到的中国实况记录下来，并汇总整理出31卷的调查报告书。这次调查的主要内容是：

1. 外国人（英、美）在华的经济活动情况
2. 中国棉花生产、毛皮生产及销售状况
3. 大运河水利设施、航运状况及其沿岸城市的物产、商业状况
4. 长江流域的制造业、交通、金融业、商业、贸易状况
5. 南北方借贷企业情况、金融状况、日中合办事业、铁路建设借贷状况
6. 南方移民问题、台湾的外来务工情况
7. 香港、外国银行及中国的新式银行
8. 中国工人的劳动效率及工厂经营情况
9. 广东的通商史、航海、鸦片交易、矿山、煤炭销售渠道
10. 中国南方砂糖生产和造纸业、两广及香港的香料业
11. 广州、广西的皮革业、广东的天然染料、发酵业、南方桐油
12. 中国的各种矿山等。
13. 中国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应

此次报告书第31卷题目是“中国内地排日、抵制日货状况”，较详细地记述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这次运动的反响，特别是对待日本的态度。通过这个调查报告，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了“五四运动”和当时中国各阶层人士对日本人的不同反应，以及当时的日本学生是如何看待中国及对改善日中关系的看法。

笔者就此报告书进行了较详细的查阅、整理加以论述。力求从客观的角度了解当时日本人怎样看中国，中国人又是怎么对待日本人的。此文若能为今后研究中日关系，了解两国关系中的这段历史有所帮助感到荣幸。

关键词：“排日” “抵制日货” “山东问题”

（在本文中把“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简称为：书院学生）

一、书院学生第 13 次旅行调查的历史背景及方法

历史背景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依仗英日同盟侵略中国山东，占领了青岛。次年（1915 年）日本大隈重信内阁逼迫袁世凯政府同意日方提出在山东、南满洲（中国东北南部）、蒙古享有所谓特权，接受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当时，袁世凯政权除了没能接受该条约第五条的第 7 款内容，“接受日本顾问”外，对其他条款都予以接受。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19 年 1 月，在巴黎召开和谈会议，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普遍认为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对此，1919 年 5 月 4 日，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为主，举行了集会、示威游行、请愿等，以此表示抗议当时政府的丧权辱国决定。有不少市民、工商界人士等，社会中下阶层人士参加。学生和市民当时克服了重重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示威，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 21 条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等口号。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史学界把这次运动认定为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其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都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影响，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大带有象征性的事件。毛泽东在 1940 年 1 月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¹⁾。在中国的现代历史教科书里，有关“五四运动”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1949 年 12 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数十年来，在中国发表、出版发行了不少有关“五四运动”的思想、理论等方面学术报告及书籍。但是，反映日本人当时是怎样看待“五四运动”及如何观察当时中国社会内容的书刊却罕见。笔者想借助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 13 次在华调查报告内容，了解日本人当时是怎样看待“五四运动”及当时日本学生眼里的中国社会，以及日本人观察到的所谓“排日”“抵制日货”“山东问题”等又是何种情况。

书院学生在调查报告书第 31 卷第五编第一章总论记述：“转年五月，以山东问题为爆发点，在中国突然发生抵制日货运动。只在数月间就变得极其“猖獗”，商品交易几乎濒临完全停止，尔后逐渐有所缓和。十月末十一月初，商品交易才出现恢复势头。可是，在十一月底又发生了福州事件⁽²⁾，再次引发出抵制日货运动，此次运动仅在数日，几乎波及到整个中国，商品交易几乎停滞。”⁽³⁾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当年的“五四运动”气势磅礴，势如破竹，抵制日货“仅用数日几乎波及到整个中国，商品交易几乎停滞。”从那时起，中国民众的

⁽¹⁾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二版

⁽²⁾ 1919 年 12 月 10 日 在福州发生近百人日本人持械殴打中国学生和市民，死伤 8 人的流血事件。福建的学生和市民抗议示威，被看作是福建的“五四运动”。

⁽³⁾ 第 13 次调查报告书第 31 卷第 5 编

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首先是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始展开。从此，中国人开始对日本在华事物及所作所为变得敏感警觉起来。学生和市民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日可行的“武器”就是“抵制日货”，因此学生运动开始奏效，日本在华的商品交易陷于瘫痪地步。书院学生认为此举“猖獗”，仅此一词便可知道日本学生对“五四运动”的立场观点。

调查地点的选择

调查地点的选择是每次调查活动开展前必须要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人群，调查地点的不同能够给调查者带来更多的资源选择。

“五四运动”的次年（大正9年、1920年），书院师生经过一年的养精蓄锐，从第16期书院应届毕业生开始恢复在华的第13次旅行调查。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踏查内容、路线都是事前经书院师生精选而定。

第13次旅行调查除了经济、金融方面以外，还重点地调查了中国内地的所谓“排日”“抵制日货”状况。此项调查路线遍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城市和乡村，调查点竟达一百多处。调查地点多，而且在同一年，对同一内容，几个班交叉调查，可以说是此次调查的一个特点。

书院学生把调查重点放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对北京、天津、上海进行了反复调查核实。当年组织了14个调查班，其中8个班先后到过调查重点地区北京、天津。6个班在上海当地调查。这也许他们可能认为这几个城市是学生运动“重灾区”的缘故。但是也不能排除书院学生有想到上海以外的各大城市看看的念头。调查班同时也去了不少中等城市，如：济南、南京、福州、厦门、南昌、武昌、长沙、大连、奉天（沈阳）、郑州等地。还去了很多至今也不太被人知晓的偏远乡村。他们选择农村的重点区域大多数在山西、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可以说他们所选的调查点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主要调查地点：

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南京、福州、厦门、南昌、武昌、长沙、大连、奉天、郑州、澳门、广东、香港、汕头、青岛、德州、洛阳、石家庄、太原九江、丰城、靖江、新喻、宜春、萍乡、长沙、岳州、临湘、聂家市、蒲圻、汉口、袁州、回府、沧州、张家口、徐州、韩庄、夏镇、徐家口、马家口、南阳镇、鲁桥、济宁、大龙王庙、五里庄、汶上县、安山驛、戴家庙、十里铺、东阿县、东昌府、临清、武城、故城、阴山、大同、开封、洛阳、孟津、清华镇、新乡、高碑台、易州、唐昌、蔚州、广灵、浑源、大同、丰镇、湘潭、衡州、莱阳、郴州、芜湖、岳州、沙市、宜昌、韶州、郴州、永兴、莱阳、梧州等。

调查点多，反馈回来的信息多，越能说明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有些地方由于地理位置或交通不便等原因，至今也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鲜为人知的地方。在那个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年月，书院学生以步行为主涉足于此，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体力。

调查内容的确定

此次旅行调查内容的筛选可分为“常规”性和“热点”性两类。以往书院生调查的主要是内容以经济、金融、民生为主，此类可称之为“常规”课题。此次调查正值“五四运动”刚结束，是当时人们对日本反应敏感时期，调查“排日”“抵制日货”“山东问题”，这可称为“热点”课题。

第 13 次旅行调查主要内容。如下：（大体可分 26 项）

- 1,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华的经济活动情况
- 2, 中国棉花生产、销售状况
- 3, 中国毛皮生产和销售状况（天津、河南、山西、张家口、锦州、直隶）
- 4, 大运河水利设施和航运状况、其沿岸城市的物产、商业状况（山东）
- 5, 长江流域制造业、交通、金融业、商业、贸易状况
- 6, 汉口、九江产麻及麻布生产销售情况
- 7, 汉口的茶叶市场
- 8, 北方地区借贷企业情况
- 9, 青岛、济南、天津的牛皮、牛骨行情
- 10, 天津、北京、张家口的金融状况
- 11, 南方地区（长沙、广东）的借贷及企业情况、日中合办事业、铁路建设借贷状况
- 12, 南方（台湾）的移民问题、外来务工情况、有关移民的各种机关、南方海外移民和金融关系
- 13, 南方地区的仓储及各地的仓库业
- 14, 香港、广州的外国银行及中国新银行
- 15, 上海的织布、棉花进出口、生产加工、纺织业状况及交易状况、工厂经营状况、中国工人的劳动效率及工厂经营情况、造纸业、面粉加工业、榨油业、制麻业、毛织业、丝绸产业、制革业、火柴、玻璃
- 16, 上海的海上保险法、保险业状况
- 17, 开港前的广东通商史、航海、鸦片交易
- 18, 澳门的鸦片交易
- 19, 矿山用语词汇
- 20, 淄川煤矿、金嶺镇铁山、抚顺老虎台坑土砂充填法
- 21, 山东煤炭销售渠道
- 22, 中国南方砂糖和造纸业
- 23, 两广及香港的香料业、皮革业、天然染料、发酵业、南方的桐油
- 24, 广东附近的重矿石以及汕头、湖南汝城、江西南安的钨矿
- 25, 桃冲、大冶铁矿山、抚顺煤矿等。
- 26, 中国内地排日、抵制日货状况（汉口、山东、河北、长江流域、广东、湖南等地）

由此可见，书院学生的第 13 次调查内容范围之广，除了军事以外包罗了当时的民生、铁路交通、金融保险、港口，矿山、民情等。他们当年旅行调查回来后一共整理出 31 卷调查报告书。笔者关注的此次调查内容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常规”课题外，还把了解当时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想法列入了调查内容。而且，专为此项调查，整理书写专题报告书的第 31 卷调查报告。此卷也是第 13 次调查报告的最后一卷，该卷分成 15 编，题目是《在“支那”（中国）内地排日、排货之状况》。在此卷里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五四运动”的反映，以及当地人对日本人的态度。这些都是颇有价值的史料。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百姓对日本的认知度，以及日本青年人対日中关系走向的看法很有帮助。

调查对象的设定

设定调查对象时，选择不同人群作为调查对象，会得出各种不同的回答，调查者能获得不同的信息。95年前，为了解当时中国人对日态度，书院学师生注意到了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广泛性。改变以往调查时只把官僚和商人作为主要调查对象的倾向，这次把军人、教师、学生、农民、妇女儿童也列入调查对象中。通过这次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他们比较重视官僚、军人、教育界的对日态度，以及人们对日态度的细微变化。不仅如此，还对调查对象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分析。报告书中把调查对象分为：官界、军界、教育界、学生界、商界、农业界、妇女儿童7个群体。调查队每到一地，基本是按以上调查对象的排序，从上至下广泛接触社会上下阶层人群。一般调查程序是从拜访当地官厅或县衙门及当地有势力的人开始，然后再与当地的下层人士打交道。

这里的“官界”是指当时地方政府行政官员，包括维持执行治安、交通的公务人员。如：县知事、警察署长、巡警等。“军界”不是指一般士兵，报告书出现的军方人物都是有文化知识的军官。教育界人士是指学校的管理者。报告书没有反映出直接从事教学和学生经常打交道的教师对日本的态度。通过报告记录知道书院学生曾力图 and 大学生接触，但是这一群体对书院学生的到来表示很冷漠或拒绝。“商界”是书院学生了解在中国排日货后，有何反响的主要对象。妇女儿童对日反应比较直接了当。总之，如此选择调查对象，基本上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员。但是，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调查对象中没有把占人口相当比例，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工人阶层列入进去，这是在选择调查对象时的最大疏忽。也许当时和这一阶层人的接触有一定的难度。

二、对“排日”情况的调查

报告书中所说的“排日”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指所谓“反日”。本文按上述调查对象的排序来梳理了解各阶层人士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及对日态度。

1. 官界（地方官僚）

笔者仅从报告书记述可以看出，当时各地官僚对来访的日本学生有的是真心表示友善，有的是面子上示好。纵观整体内容，书院学生的感觉是“这一阶层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排日”。其中，书院学生大加赞赏当时被评为所谓“支那”（中国）模范省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他在军事上采用日本模式，在教育、警察制度上借鉴日本体系，还倾心内治行政，亲自题写“民德四要”（信实进取爱群）额匾，以及列举训言三十四条，以此展示国民道德大纲，教育山西省民。认为当山东发生问题时，中国各地都发生了暴动，但是在山西省农村不言而喻，即使在城市也没听到过反日的声音。从太原到大同的沿途各县知事都亲切地接待书院学生，有的还专门派护兵对书院学生备加保护。并给他们提供一、二辆马车使用。书院学生到广灵县时，县知事召集了主计员、承政员等衙门的主要官员，为日本学生接风洗尘。所以书院学生从太原到大同的旅行感到很愉快。书院学生

在报告里感慨地写道：“这些应该归功于山西督军阎锡山在教育界、实业界清除了排日派的结果。因此，在他管辖地方的各行各业都听不到排日声音。”⁽⁴⁾

在**蔚县**，县知事还特意到书院学生住地回访，为书院学生题字以示慰劳。该县警察署长也特意赶到书院学生住处看望。警察署长只知道日语的“君”和“我”的意思，尽管如此他也跟书院学生神侃了一番。书院学生把他们的这种行为看作是想取悦日本人，在向他们套近乎。书院学生拜访**易县**知事时，知道了知事的儿子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从知事的言谈话语中也能感受到在他的身上也有在日留学的中国人习性，该人没对日本学生表示出什么好感。但是到了农村，那里的百姓很纯朴，路遇小学生，孩子们见到日本学生，突然停步，立正脱帽敬礼。根据此现象，书院学生分析“排日运动，还没侵蚀到乡下深处。”

在**南昌**，督军副官、省长公署的官宪接见了书院学生，与他们进行了交谈。书院学生感觉在那里没有排日迹象。这些官员还给到访的书院学生纪念册上题字留名。所以书院学生以此分析判断该省省长、公署本人之所以对日本人亲善，可能是因为他曾在日本山口县高等商业学校留过学的缘故。在**江西省广昌县**，县知事周忠精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被称为是亲日派。所以日本学生一到该县，警察署长就特意前往住处问候，对日本学生非常和善。并告诉他们去下一站的路应该如何走，还亲手画了一张去下一个县的路线图。尽管如此，书院学生反而对他的如此好意却产生了疑问，“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出自于亲日，还是他们不晓得现在在排日一事。”

在**汉口**各国领事馆的领事中，日本领事濑川与王督军关系最好，每逢日本节庆时，王督军肯定到场。濑川领事在王督军甲子庆典时，还带着绣有寿字的绸缎前去参加。可见濑川领事在王督军身上下了一番功夫，做了不少工作。书院学生评价王督军对日态度是“不媚不偏、正义公道地对待日本人及各国人。所以武汉地区局势相当平静。我们应该信赖我们的督军。”

在**武昌**，书院学生访问了省长公署的内务科长。同样也没见到他有一点排日迹象。据说该科长本人也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会讲一点儿日语。在他的桌上还摆放着柳泽博士写的《日华共存论》一书。观其态度，他也是个亲日派。在武昌的路上到处可见巡警，他们对书院学生倍加关照，生怕他们遇到危险或碰到什么麻烦引起外交问题。武汉官僚与日本官民关系一向良好，虽然爆发了排日运动，但是仍然保持着和日本人的交往，看不到有疏远迹象。对本省人的排日行为，督军和省长向全省发出告示，告诫人们不要妄动，禁止上街游行和演讲，并控制了报刊言论。同时还采取解散学生联合会、停止发行激进报纸、提前让学生放假回家等措施。尽管如此，福州事件发生后，在武汉还是有人召开了民众大会。书院学生认为他们所实施的取缔法不够彻底。当日本官员见督军和省长时，督军和省长对其省民的行为向书院学生表示遗憾，并强调要采取更加严厉的取缔措施。此后，武汉的局势一直很稳定。传说武汉督军和省长与日本总领事以及日本派来的司令官交往极其密切，对日方所提出的要求一向言听计从，所以日本学生对他们的评价是：武汉的官僚对日感情虽不能说是绝对亲日，但也相当不错。

⁽⁴⁾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一编

在**长沙**，书院学生访问了张督军的弟弟张敬汤。他在客厅里愉快地接见了学生，并叫副官出面负责招待他们，还把书院学生请到自己的房间，给他们讲“中日亲善”的必要性和唇齿相依的关系，并欣然地给学生题字。

在**济宁**，县知事对书院学生很友好，他哀叹中国学生的鲁莽之举。对书院学生提出了希望中日两国人要尽快合作的愿望。当地的警备队长宋德明在陈述了军界意见的同时，也介绍了他们是如何严加管束学生排日活动的情况。

在**怀庆县**，衙门安排书院学生住宿，还免收房钱。**曲阳**、**山阴**两县的知事也都到书院学生住处回访，特别是**山阴**县知事还送给学生礼物。**饶州**知事是北京人，也没有一点排日的意思。他也愉快地答应给书院学生的纪念册上题字。

在**德州县**，书院学生访问了县知事，受到了热情接待。学生们还和各界人士进行了接触，都感到很亲切，没有感觉到他们有排日的迹象。书院学生认为：那里的人可能是因感受到日本方面的威慑所致。**宜春**县知事葛延轮、**萍乡**县知事范氏、**临湘**县知事裴瑾、**萍乡**县警察所巡警夏道衡、**聂家市**警察分署长刘学讲都对书院学生非常友善。他们斥骂外国人在华横行，对中国学生愚蠢暴动感到愤怒。所以书院学生以此断言：“中国人中属于旧知识阶层或官僚的大部分人都是亲日派，不是反日的。此次排日运动完全是学生和一部分商人所为，应该知道官界并没有因此而动摇。”⁽⁵⁾**九江**警察还计划帮助商会镇压学生运动。

但是，书院学生在**兖州府**却遇到了冷遇。在访问县衙门时，他们先递上了名片等候，没想到返回来的名片背面写着：“知事不在，无事请回。”所以书院学生以此推断该地官僚有排日情绪。这种情况也与他们出发前所耳闻的**兖州府**情况相符。

书院学生听说在“**南京**地区一般官员自己主动参与排日活动的不多，但是很多人认为取缔学生运动不够彻底。眼下在官界对日本有恶感的人绝对没有。”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书院学生接触到的官僚中在日本留过学的或与日本有瓜葛的人不少，他们中绝大多数对书院学生表现出热情好客，甚至有时表现出过于殷勤，使书院学生有受宠若惊之感，甚至有时鄙视他们那样的热情。报告书中**聂家市**警察分署长刘学“斥骂外国人在华横行——”的记叙，这个警察分署长也许是在对书院学生顺情说好话，也可能在指桑骂槐。因为他没有指名道姓，明确指出他在谴责哪个国家。

至于**兖州府**的回应使书院学生感到有些不快。那天是知事正巧不在，还是有意不见？还是知事不在别人不敢代替接见，笔者不得而知。但是让日本学生等了半天，返回来的名片后面写着：“知事不在，无事请回。”由此可以推断知事是有意不见的成分比较大，返回的名片上写着“——无事请回”，在中国一般是在谢客时才用这种方式。书院学生验证了他们出发前耳闻到的**兖州府**情况。笔者似乎看到了当时的**兖州府**知事是一个山东大汉，有一股倔强劲，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总之，地方官僚中大多数人对日本学生表示出热情好客，也有个别的地方官僚显示出格外殷勤，对日本学生示好。他们也有向日本学生说些谴责本国学生行动的话。但是也有像**兖州府**知事那样对书院学生冷淡，避而不见的。**易县**知事本

⁽⁵⁾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五编

人虽然没留过日，但是他的儿子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从他和日本学生的言谈话语中能使日本学生感受到知事身上反应出在日留学的中国人习性。这里的“习性”恐怕不是什么褒义词，很可能是此县知事的做法与其他县知事等官僚不同，对日本年轻人不卑不亢，没献殷勤却让日本学生感到不舒服。在日留学过的中国人中，这类人大有人在。总之，当时的官僚并不像书院学生在调查报告中所判断的那样，地方官僚都对日是友善的。可以说多数示好，个别“失礼”。

2. 教育界

报告书中记述：“听说南京的排日根据地是金陵大学，所以在那逗留期间我们虽稍感到有点危险，还是决定照访该大学。该校正如世人所知那样，是由美国人经营，有四、五名中国教师、二十五、六名美国教师。首先我们向中国教师递上名片并告知来意，他们非常诚恳地为我们提供方便，陪同我们参观教室和宿舍等，还进做些说明。学生们在上课（用英语授课），他们送给我们四个人教科书还介绍了课程情况，我们也参观了科学实验室，尽管是在课外时间，他们也特意为我们做试验。我们也观看了历史课教学。当我们提出想和他们照张合影，他们也欣然接受。在我们要离开该校时，他们送给我们该校章程。被称为排日根据地的该校，能如此接待我们是出乎我们的预料。”⁽⁶⁾

由此可知，此次去南京金陵大学的书院学生共有 4 人。他们没去该校前心理有些忐忑，因为他们认为南京金陵大学是排日据点。但是校方还是对来访的日本学生以礼相待，让日本学生参观学校的各种设施、观摩教学，并和来访者一起合影留念。调查报告只是记述参观学校的过程，没有提到和该校教职员工的对话内容，也没有介绍和该校学生是否进行了交流。因此，没有通过交谈看表面很难判定教育界对日的态度。他们只是感觉到教育界同情学生运动。通过对书院学生的接待，可以看出教育界人士还是把日本政府和国民区别对待，对日本青年学生的态度还是相当理智友善的。

根据报告书内容判断，书院学生直接跟教育界人士打交道次数并不多，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在教育界很少有人反对学生运动。山东事件发生后，武汉教育界人士与各商会、学生会联合决议，要求坚持谋和使节的主张，计划举行国耻纪念会。但是被政府取缔没能实施。当时的文华大学当局表示反对学生运动。在教育界，学校的经营者和教员对事态的看法不同，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和日本都是司空见惯的。中国历次大的学生运动都有教员在幕后对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总体来说教育界对“五四运动”赞成支持者居多。所以书院学生判断“南京金陵大学是排日据点”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当时的排日据点不止是一个“南京金陵大学”。

3. 学生界

由于山东问题发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排日运动高潮。书院学生认为，这次排日问题的发生，中国学生是排日先锋，他们是在打着爱国旗帜。报告书中有以下记述：“武汉地区排日急先锋是学生。因山东问题发生，他们掀起了排日运

⁽⁶⁾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 31 卷

动，组织武汉学生联合会，并与北京的学生遥相呼应。决议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罢课、罢市及以示威游行手段，争取收回青岛、取消日支条约。他们打着写有“勿忘国耻”“提倡国货”“力争青岛”等口号的小旗，还出现了砸日货，殴打日本人事件。因此，政府宣布禁止集会，停止发行学生周报，解散学生联合会。因此，这些学生事后都潜伏起来，继续“蠢动”。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以布教为名，组织学生布道团，在暗地里鼓吹排日。”⁽⁷⁾由此可见当时武汉地区学生运动气势不小。

这次调查，书院学生在乡下的时间较多，在城市和从事教育工作者的接触却很少。他们在旅行中所见到的学校大都是高等小学，中学也非常少。在**南昌、武昌、天津**他们耳闻了一些学生运动情况，认为：“那些学生都是以爱国为借口而得意，其实并没有什么主义和抱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只是抱有了不参加考试就可升级的幼稚想法。这样的学生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指导这些学生的教师，只是为了怕伤学生的心，为讨好学生，屈从于学生，我们见此很寒心。”⁽⁸⁾书院学生对中国学生参加运动动机的揣测与对学生运动反对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

调查报告中还写道：**九江**南威烈学校、**武昌**文华大学、**宜昌**美华中学的学生都是“排日”急先锋。书院学生分析其原因是“他们是因为受到美国派来的传教士影响。武昌高等商业学校定于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1、2年级学生参加了“闹事”。可是3年级学生没有参加。在长沙师范学校、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受到去年从上海来的学生宣传队的煽动而进行了罢课。”⁽⁹⁾

山东省排日中心地是**济南**。在济南，书院学生想去齐鲁大学参观，当时被该校学生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书院学生看到路旁的中国学生时，总觉得他们似乎在用“这些倭奴来干什么”的眼光盯着他们。可见两国青年人的立场观点是如此针锋相对。

地处大运河沿岸的“**东昌府**（现聊城市）是一个仅次于济宁的大城市，有道尹衙门、县衙门等。这里的人对日本人感情最不好，那里的学生仍在贴传单。该市的鼓楼里贴着宣传耶稣教的大字报，上面还写有排日歌词曲和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小学十人团、救国人团联合会等写的里排日文章，太过激的内容逐渐被撕掉。对那的官界、学生界情况很难断定，但是在此地的排日影响相当之大，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他们的排日手法还很幼稚，没有达到像北京那样。5月的一天，我们到济南城内参观，这时有人从背后朝我们投来石块，一看有几个“支那”学生对我们说粗话。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50天的旅行中还是第一次遇到，甚感不快。以前听说过济南学生的态度粗鲁。——最近“支那”当局对这种行为严加管制，此类事件逐渐减少，商人才得以放心地回去做生意，——”。

以此，书院学生推断“支那”学生仍然有排日情绪。与此状况相反的山西省学生几乎对日本都有好感，很多人还想到日本留学。

⁽⁷⁾同上 第五编第一章总论第三节『学生界排日感想』

⁽⁸⁾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31卷第五编

⁽⁹⁾同上

调查报告书记述：北京和天津的学生与上海的学生遥相呼应，确是排日运动的策源地。在运动开始阶段，中国学生比较盲目而无秩序。随着排日运动时间的推移，他们积累了不少经验，进入了理论性研究阶段。所以运动发展秩序井然。官界、学生界、教育界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开始认真研究排日问题。报告书中引用一位中国进步学生的话：“我们排日来自于天真的想法，这次排日并不是简单的排日，我们是想通过反抗时势为契机，铲除本国政府、军阀中的徇私舞弊。促使支持他们的日本政府反省，所以我们排日、抵制日货。在促使贵国政府反省的同时，搞清本国政界的外环境。我们应该把运动坚持到贵国对我们排日运动有了真正了解为止。等到中日两国相互反省时机到来之时，我们将衷心地与贵国携手实现东洋和平。”⁽¹⁰⁾ 书院学生对这一观点持乐观态度，并认为：“这是有识阶层的排日思想。近来我国思想界的运动也与邻国学生运动及其精神不同。如果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两国人一定会亲近。若能这样，可以把这个称之为日支亲善的曙光。”⁽¹¹⁾ 青年人反对旧势力，反对腐败，谋求亲善友好。这是两国年轻人难得的共同愿望。

书院学生在北京、天津接触中国人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在市面上根本看不到排日情景，更看不到曾在上海发生过污蔑日本人的现象，街道气氛相当平静。尽管如此书院学生似乎还是感觉到当地人们仍有排日情绪。中国学生虽高喊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但是没有看到他们扣押日本货或妨碍日本人的事件。在当局取缔排日运动前也没有见到那种情况。由此可见，当时北京、天津学生及市民对待日本人和日货还是相当理性的。书院学生认为“学生运动一度被认为是很危险的，但是对其没有采取彻底取缔。不过，人们逐渐地感到日支两国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近来甚至出现了提倡日支文化合作的人增多。”

由此可以知：95年前两国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政见立场不同，但是希望日中合作交往的心愿是两国百姓的共同的。

4. 商界

书院学生对商界人士的处境表示同情。认为中国学生的排日运动却给一般商人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一般中国商人对那些掠夺、烧毁他们日货的学生非常反感，同时也暗暗地谴责有些报纸使用过激言辞煽动学生。书院学生认为：“其实那些抵制日货和罢市的人，大多数都是受学生团体胁迫的商人。他们表面上是为了迎合学生而被迫进行罢市。”书院学生分析，即使这样的商人对日本人即使没有好感，也绝不会有恶感。

“在北京由于学生提倡抵制日货运动，使商人在经济上受到了一些损失。其中有些商人对学生的做法产生了反感。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日持有好感。有的商人受到学生煽动，对日本产生了恶感。书院学生在报告书中说：一般民众特别是商人对日看法相当不好，很多人对日本人流露出不逊和冷淡态度。他们在京绥线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一个天津商人，在聊天时，书院学生自称自己是从上海来的中国学生，对方却信以为真。那个商人向书院生讲起了排日情

⁽¹⁰⁾ 《在五四运动第二年排日排货的状况》(二) 谷光隆 编订《纪要》114 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239 页

⁽¹¹⁾ 同上

况，并不断地谴责在天津的日货。对有关山东问题，他说日本是侵略主义者，帮助我们的是美国人，所以我们要和美国人友好相处。书院学生写道：“从这番话可以看出他们对日本是厌恶的。”通过这些介绍可以知道当时书院学生的汉语水平还是不错的，能以假乱真，使天津商人把书院学生错当成中国人吐真言。

报告中记述：在**山东**抵制日货给一般商人带来了很大损失。有的中国学生掠夺或烧毁了一般商人的日货。日本学生认为：中国商人需要日本货，所以没有像学生那样地去抵制日货。报告中写道：“在中国被称为硬骨头的人很多，恐怕官界有一部分俊杰、商界里也有。但是，以我们的见识而言，商界没有排日的。不过，在英美企业的喽罗们以经营欧美商品为业，认为通过排日可从中获利。在内地从大商人到小商贩，崇拜日本的很多。我们感谢南昌亲日派商人胡隶，他不断地说，排日思想对本国不利。并骂学生是瞎眼。我们肯定他的行为。”⁽¹²⁾

报告中记述：像在**武穴**那样的乡下，如果日本人不购买他们生产的麻，那的农民就很难维持生计，所以在农村没有受到抵制日货的影响。但是，当时有点文化能看报纸的人，却对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不满。棉纺织厂工人有与日本对抗的意识，排日情绪高，常喊要抵制日货。在**张家口**居住的日本人虽只有几个人，但是他们经营的商品很多。从蒙古到张家口的集散商品几乎都要经日本人之手，所以张家口的商人对日本人寄予很大期望。因此书院学生认为在张家口，看不出中国商人排日的迹象。

5. 军界

书院学生对军界的对日态度感到满意。在**萍乡**到**汉口**，一路上见到的几乎都是军人。出乎书院学生的预料，中国军人有些专横跋扈。当地的铁路也都是军用铁路。各处的停车场都写有“○○军警监查所”牌子，有军人在那里驻扎。火车到站发车都是由军人管控。所有军人都可免费乘车，特别是在萍株铁路萍乡站的检票员也都是军人。但是，就是那些对人蛮横的军人却对日本人毕恭毕敬，他们把车厢里的中国人统统都赶到别的车厢去，特意为日本学生腾出座位。书院学生所到之处都是由军人开道，他们对日本学生显得格外殷勤，给日本学生提供很多方便。在**安源**受到了萍乡监查所所长方礼三（陆军中尉）特别热情的关照。方氏让他们观看各种军事书籍及武器，并说了些“支那”军队受到了日本恩惠才有今天，日支要友好之类的话。书院学生在**岳州**参拜了一座庙宇，在那也有军队驻扎，连长王群福热情地陪同书院学生参观，还以茶果相待。在**洛阳**龙门游览时，书院学生遇到正在行军路过该地的中国青年军官（大尉），该人特意下马步行与学生边走边聊了一里半路。他与书院学生亲切聊天并合影留念。该军官不断地对书院学生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要相互提携。最后还跟书院学生讲了自己想到日本军官学校学习的愿望。该军官还向书院学生打听在日本的生活情况，以及在日本每月生活费用需要多少等。数日后，他还把和书院学生合影寄给他们，还附上自己的名片，上面写有兵营的地址。同时他还向书院学生发出了邀请，让他们一定去他那玩。所以，书院学生对他颇有好感。“通过此例可以推

⁽¹²⁾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31卷 第四编

测出军人中大部分不是排日的。军衔越高越不排日。”⁽¹³⁾ **济宁**的警备总队长宋德明对日本学生表示要严肃取缔排日运动。武汉的王督军是一个亲日派，所以武汉军界对日本感情相当好。

书院学生在京浦线火车上遇到了很多中国军人，同他们进行交谈和笔谈。书院学生对此写道：“从这些军人（至少从他们个人身上）根本感受不到他们有一点排日。我们怀疑他们也许没受过教育，或不知道有排日的风潮。”⁽¹⁴⁾ 笔者认为；当时的军人对时事政治、国内动态并不了解。那时也没有收音机之类的广播通信器材，一般军人无法知道近期国内外发生的事件。军人来自于老百姓，所以他们也有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热情好客一面，特别是对外国来的年轻人，更显得热情。因此，博得了书院学生好感。如果他们知道学生运动的真情，很难断定他们都会如此热情对待日本人。

在去**南京**调查班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述：“督军李纯是一个温厚的人，我们不能说对此人有好感，也不能说有恶感。有一天，我们到日本领事馆询问要见李督军面谈需要办理什么手续时，被告知他生病了，前几天一个日本知名人士拿着介绍信想去见他，但没能见到。我们没拿介绍信想见他，还是未果。不过，我们好不容易来到此地，很想见他，恳求把我们的名片递上去。不久参谋爽快地来见我们，热情地告诉我们，李督军现在公务繁忙，明天你们拿着领事馆的介绍信来一定能见到。我们出来时要求和参谋一起在公署前拍照，他也爽快地答应了。他像对待普通士兵一样很有礼貌，给我们的感觉良好。”军界对日本学生如同官界，热情友善。

6. 农业界

书院学生对所谓农业界人士的定义是：“据我们所知几乎都是百姓，一般农民目不识丁，不懂什么是文明，和日本内地纯朴的百姓并无两样。对人非常质朴亲切，人们不问排日也不知亲日。看到我们是外国人讲的是外语，显出格外崇敬神色。老人中也没有排日的。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农民模样的旅客，向我们打听火车到站的情况，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日本学生，但是他还是说听我们的口音像广东人。问他知道日本吗？他却反问日本是不是一个商品名。提起东洋，他更是难于理解。”⁽¹⁵⁾

其实在此次调查过程中，书院学生接触农民很有限。他们认为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没有文化，尚不知日本大帝国的存在。一部分学生说难以确认有关农民的对日态度，但是另一部分学生却给没有参与学生运动的农民下了一个结论：“可以说（他们）是完全麻木无血动物，所以没有参与学生的蠢动。”⁽¹⁶⁾ “在**大龙王庙、五里庄、汶上县**一带看不到像济南那样的排日行为。他们看到我们是日本人把我们当作外国人来对待，让我们参观了师范学校、小学校等，没有发现对我们抱有恶感的感觉，也看不到张贴传单的现象。”

⁽¹³⁾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31卷第一编

⁽¹⁴⁾ 《五四运动第二年排日排货的状况》（二）谷光隆 编订《纪要》114 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¹⁵⁾ 同上

⁽¹⁶⁾ 《五四运动第二年排日排货的状况》（一）谷光隆 编订《纪要》113 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可想而知在偏远乡村各方面的信息很难畅通传到，即使当地人知道了什么信息，由于人们文化程度和知识面所限，要知道、理解、处理、消化一个信息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乡村很难看到排日情况。

由此可见，偏远的农村与世隔绝。在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各方面信息较比灵通。可以说城市越大排日的情绪越大。虽然农民没有排日现象，但是，书院学生还是对无知的农民看不起。因为即使向他们询问“五四运动”情况，如同对牛弹琴，他们根本听不明白，所问非所答。书院学生从农业界没有收集到想了解的内容，农民只是“完全麻木的无血动物”而已。

7. 妇女儿童界

书院学生认为：中国一般市民对山东问题、抵制日货不关心，只不过是学生煽动下才引发起对日本的厌恶感。可是到江西调查的书院学生认为：从表面上看没有排日的现象，既使有也不会太厉害。然而去江浙一带调查的人却写道：

“教育的势力很可怕。我们在所到的小学听到的都是在讲日本暴政等。儿童们有意无意地唱着排日歌曲来迎接我们。妇女们谈不上排日和亲日，她们在六、七岁时正值日俄战争，说她们帮俄国，她们听后似乎会感到愤慨和感到被诬蔑。但是无论到哪，在儿童中能感觉出有类似上海附近那样排日倾向。至于其他人士情况和我们以前从报纸上看到的一样，有排日思想。对此，书院学生又自相矛盾地说：“总之，大部分“支那人”没有排日思想。但是，年纪小的儿童常常唱着排日歌曲，年轻学生喊排日口号，这种现象应值得人们思考。”⁽¹⁷⁾ 书院学生认为：济南是商业城市，与日本商界发展相辅相成。和日本来往，“支那”商人也受益不少，可以说在那没有排日的情况。但是，根据去济南调查的学生描述：“城内的一般中国人，他们受到了学生和教育界、商界情绪的影响，总觉得街上的孩子们都在用那种似乎在说“你们这些坏家伙”的蔑视眼光看着我们。”

“从张家口乘火车回北京的路上途经大同时，上来了很多中国人。我们和他们愉快地交谈，根本感觉不到他们对日本人有任何反感。我们把自己带来的“清快丸”“大学眼药水”“牙膏”以及我们受上海真崎洋行委托带来的一些有关农具样品小册子分发给他们，他们都很感激地收下了。中国旅客每当火车进站，都要下去给我们买包子和煮鸡蛋吃。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根本看不出他们是中国人。使我们感觉像是自家邻居一样亲近。”⁽¹⁸⁾

通过书院学生在华调查的直观感觉，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地方官界、军界、商界以及在乘火车旅行时遇到的中国人对他们都是相当亲善友好的。但是尽管中国军人对书院学生热情友好，书院学生仍对他们持有疑心。他们心有余悸的写到“他们对我们的真实态度如何，我们很难得知。也许是因为有政府命令，他们知道伤害日本人有害无益的缘故吧。”⁽¹⁹⁾但是在教育界，同情学生运动者居多，农业界对学生运动漠不关心，竟被书院生说是“无血动物”。“只有商界、军界、官界的人亲日。”中国学生对日本态度不言而喻，天真无邪的儿童无意识地唱着

⁽¹⁷⁾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31卷第1编

⁽¹⁸⁾ 《在五四运动第二年排日排货的状况》(二) 谷光隆 编订《纪要》114 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¹⁹⁾ 同上

排日歌曲“迎客”。可以说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他们周围成年人的对日的态度。

在**济南**书院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广知院”博物馆。在这里给一般中国人展示着日本人的古今风俗介绍，但是，书院学生看后感觉到那个展览不是在宣传亲日友好，而是在介绍研究如何排日。所以书院学生认为当地的官界、商界、军界、学生都沉浸在排日的气氛中。

书院学生总结：“一般下层人不知道什么是山东问题，什么是排日，只不过是学生及其他人的煽动而产生了憎恨日本人的念头。所以，眼下对他们的排日想法不必过分担忧。”“如果像**乌海**地区那样对日感情良好，可以说一度出现的抵制日货运动在那绝对不会发生。”

报告书归纳：“总之，在中国北部的排日活动已经终止。如今思考那时的原因是由于贫穷所至。人们只说是由于外国人煽动而爆发，这样的说法大都雷同。时至今日应该醒悟，事实上酿成排日现象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只是因为中国人对“支那”商品感到困惑的缘故罢了。”书院学生观察中国的排日现象很有局限性，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排日现象，没有从更深层去思考中国人的反日思想根源。

三、抵制日货情况

书院学生在中国内地城市见到的日货很少。因为在卸日货的船码头上常有学生在那监视。所以看不到“仁丹”“狮子牌牙膏”的广告。在销售“仁丹”“清快丸”的店铺里也没摆放“仁丹”和“清快丸”，已经改放了一些日用商品和学习用品。在江苏省**南京**，日货受到了严重打击，虽说仁丹广告仍到处可见，但是抵制日货的浪潮还没有完全平息。在江西省**九江**，自抵制日货以来，日货受到了很大打击，城内外看不到日货，抵制日货运动仍然很厉害。可是在农村的**丰城县**、**临江府**、**靖江县**、**罗方街**、**新喻县**、没有排日货现象。在新喻县仁丹广告很多，街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日货。在**分宜县**仁丹广告最多。在**宜春县**、**宜风**、**芦溪**日货也很多。在**萍乡县**日货相当少影响不大。在**安源**几乎看不到日货。在湖南省**长沙**的日货交易完全停止，见不到日货。当地的经济状况不好，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黑货流通、不可兑换的纸币在流通、治安警察无序、军人专横跋扈之缘故。在**岳州**还有不少日货，但抵制日货势力相当大。**临湘县**是交战之地，几乎看不到日货。在**聂市**市场、**羊楼洞**看不到日货，可能是因为地方太小。**蒲圻县**日货相当多，而且广告也很多。**武昌**也许因为学生多，抵制日货的浪潮相当高，但是在汉口日货到处可见。但与以前相比几乎看不到什么交易活动，交易市场不得不迁往内地。

书院学生认为**天津**是排日货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尽管如此，在街面上看到的抵制日货的现象也很少。但是进入到中国人居住区，使人感到排日货浪潮的余波仍在。人们买伞时先问：“此伞是国货还是日货？”书院学生认为：一般中国人想买日货也不敢买。他们在**长沙**看到了进口海产品，在**岳州**的日货商店都关着门。“樱花”牌啤酒都改成了“上海”牌啤酒，类似这种现象很多。但是，在**武昌**劝业场的商品中六成是日货。他们认为中国学生排日、抵制日货行动是因为“陷入近代新思想的泥潭，激进地崇拜欧洲主义。所以，中国的排日风潮达到极点，直接影响到各个行业。随着时间的流逝“支那人”会自己觉悟，抵制日货影

响也会逐渐缩小。奇怪的是中国各家报纸、日本国内报纸或杂志都登载一些排日狂还在继续的报道，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到各地去参观，所有的推测都是出乎我们的预料。可以说这次运动是由一些人煽动而引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几个留日归国学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虐待，为了报复而挑起了这场运动。其实这都是因一些小事而引起的，学生们的嗓门比较大，显得事情闹得很大，其实只不过都是因一些鸡毛蒜皮小事而已。我们所看到的排日现象并不是没有，各地抵制日货相当厉害。这主要是一般中国商人受到一部分愚蠢学生的威迫，不得已地去做那样的事而已。那些商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真有点可怜。在中国越是抵制日货，物价就越飞涨，老百姓对生活越感不安。”⁽²⁰⁾就“仁丹”“灵丹”而言，出现了各种“仁丹”商品，打出国货、完全国货的招牌来吸引顾客。到处还张贴着传单，写着“中国人都用”“中国药”等，还有“抵制日货”“勿用劣货”“用劣货者是国贼”等字样。相反，他们想采用卖假货手段，但是销路并不好。商店里的“仁丹”“狮子牌”牙膏等都是几年前的库存货，有的已变色。其他日常用品还在大量地进口，将商品运到乡下，日本很多商品都用英文标写“Made in Japan”。在易州、大同看到还在销售日本日用品。

在山东青岛一带，当时是由日本“守卫军”控制，所以感觉不到有排日情绪。但是有济南和北京的学生在这进行秘密宣传和演说。

临清和德州离天津不远，商业、交通来往较频繁，书院学生和商人、军人、官吏、商人等都进行过交谈，中国人都对他们表示出善意。在这些地区虽然日货不多，仅有少量的其他杂货品。但是在那完全感觉不到排日的气氛，所以日本学生非常高兴。只是在鼓楼这样有很多人来往的地方张贴着排日的传单，其大部分都被撕掉。

书院学生注意到当地日本染料厂家的销售方法是在销售当地生产的染料，所有产品标签或制造者名称都是用印有中国人参与经营的字样，若只标日本人生产的话，会受到抵制日货的影响。不仅是染料制造业，皮革行业的销售也都是采用同样的方法。

书院学生分析要减少抵制日货活动和抵制势力，应留意下面几点：

- 1，应该让“支那人”觉悟到抵制日货相反会使自己生活受到影响，对己不利，没有好处。
- 2，官方向民众发出告示，排日、抵制日货会在国际上使本国陷于不利境地，号召人们不要参加。告戒人们若有参加者要严加惩罚，要自重等。
- 3，日本商人要自重。要隐忍自重一年半载必有好处。
- 4，新闻论调应改变。内地各中文报纸对排日的报道要有些缓和等。

书院学生在调查时也听到各商户说，自抵制日货以来，有的产业得到了振兴发展。但从中国整体来看，那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他们认为，在其产业发展不够充分时期，中断对日贸易只会使中国各界人感到痛苦，各商铺的损失和萧条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所以从中可以了解到这场排日及抵制日货运动已经基本得到了平息，各界中国人对日感情已趋于完全缓和。在学生中还有对日本外交及

⁽²⁰⁾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31卷第5编

军事行动感到不满的情绪，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能采取绅士作风的人很少。但是应该看到学生中间已逐渐萌生自我控制的想法。并告诫日本方面要很好地认识到，目前排日声音虽然一度消失，但是这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发生更大的排日运动。

一般交通方便，教育程度高的地方抵制日货强烈。反之，在偏远地区很少有抵制日货情况。即使出现了抵制日货现象，书院学生也将其原因归于当地长官身上。“在**东平县**管辖**安山**站地区，虽不是排日最厉害的地方，但是那里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态度比较生硬。他们用傲慢的态度检查我们的护照，要我们的名片等，这足以可见此地的县知事是排日的。在只有二三百人口的贫困山村也飘着提倡国货的旗子，到处写着“勿忘勿忘”的标语。”

“以前，**郑州**地区的官民和我国国民的关系非常好，山东问题发生后，排日运动在各个县城广泛开展，治理后没有出现什么排日的情况，可以把它看作是亲日的依据。另外郑州市不只是河南地区，也是陕西地区物产的集散地。对日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城市，所以更应该维持好这种势头。还有在该地驻扎的军队是奉天军，他们对日本人有好感，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在洛阳，曾经听到排日、抵制日货的声音，在各个县城也立即掀起了排日、抵制日货运动，撕毁我们的仁丹广告。现在，墙壁等处仍然可以看到张贴的榜文，上面写着“支那”一个流行语。听说还有对我国旅行者住宿加以妨碍的事例。不过，目前这样的情况很少。”

“在**张家口**常住的我国人只有五、六个。大部分都是经营谷物的。然而，张家口“支那人”使用的日用品大部分都是日本货。如果抵制日货，一般人在生活上会感到痛苦。所以也许是从其生活的需要来看，在离这很近的北京，很多人在进行抵制日货时，在张家口还是平静的。”

在大城市有学生活动的地方，抵制日货现象比较多。在乡下，大多数人不知道外地所发生的情况，市场上仍然能看到日货在销售。所以书院学生认为他们不抵制日货的原因是人们过于依赖日货的原故。

四、关于山东问题

书院学生到**山东**时，那里人对山东问题关心热度已经降温，有人提出把山东移交给国际联盟管理，由中国人直接去交涉等。书院学生认为“与有四亿人口的中国人争辩这个问题很难，若要把谈论山东问题的人抓起来的话，恐怕得抓数百万人。书院学生分析，真心谈论此问题的也就只有十人二十人而已。一般中国人对此事并不关心。他们认为老百姓的一生就是种田吃饭，官吏收税，外交事务由负责外交的人管。老百姓并不忧国，只是为收成少了而伤心。所以面对这些人，就山东问题没有什么可向他们提问的。可是，他们就有关这方面问题向各地的县知事直接提问，大多数人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沉默不语。当然，除了大城市知事以外其他地方的人好像也没有自己的主见。在济南听到当地的参谋长及秘书说，日本参加欧洲战役与德国开战，终于占领了胶州湾租借地，直至今日仍把持着德国原来拥有的权利。现在，随着欧洲战场的结束，人们开始对归还青岛问题议论纷纷，并成为排日的导火索。但是这只是受一部分政党左右而已。在中国，人们对谁掌管一事都不太感兴趣。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国库贫穷，在世界上也处在无与伦比的地步。假设青岛被归还了，要为维持青岛现状还需巨大支出，这样还会使

中国政府更加感到窘困。所以与其谈论山东问题，还不如应先谈南北统一的问题，还有清理国库问题等诸多重大问题。不充实内部的实力，焉能抵挡外敌？谈论山东问题会再惹起学生运动，使中国政府更加为难。

可见书院学生把山东问题看得如此简单，只是把这一问题看作一个单纯的财政资金问题。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重大问题。用当今的说法就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问题。所以面对日本学生的提问，地方官员不敢轻易表态。

五、书院学生对日中关系的思考

书院第 16 期学生接到学校指示，于 1920 年 3 月 29 日出发到各地进行旅行调查。他们出发前已做好了此行会受到排日影响的思想准备。但是，在路途中只遇到了一次。此次踏查反而使他们出乎预料地尝试了一次“舒适旅行”。在开往**开封**的火车上，书院学生因不习惯在中国的铁路旅行，一位自称是杭州人的中国人，在各方面给他们帮助。在**开封**第一次访问县知事，城门旁边有日货检查处，有几名巡警在那值班。不过，在城里看不到排日的痕迹。只是外交部的人和巡警不断地询问他们是否有护照而已。

书院学生在**青岛**到处可见日本人。那里的日本人势力很大。所见到的中国人只是些拉洋车的。所以在青岛根本找不到排日、抵制日货的材料。不过，书院学生为当时的中国百姓被歧视，感到不平。在山东铁路夜间乘车时，看到列车员为把日本人和中国人隔离开，把有日本人乘坐的车厢内还在熟睡的中国人叫醒，并大声喊叫着把他们轰赶到其他车厢去，这使书院学生对中国乘客产生了同情心。

“使我们感到中国人这时受到了某种侮辱。列车员应该改变说话口气和态度。在日本乘客面前如此赶中国乘客，可见这些列车员的举止是多么轻薄，对待自己的同胞这么粗鲁，良心何在。当我们问到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回答说让中国人和日本人坐一个车厢，日本人的行李经常出现丢失，所以是为了防止被盗窃。这的确是一个理由，注意一些是应该的，但是要注意对同胞说话方法和态度。”

书院学生在青岛还看到有个别的日本人依仗人多侮辱中国人的现象。“日本人赏樱花或参加什么祭祀活动，酒喝得酩酊大醉，像一个下贱娼妇，中国人围观看热闹，这也是日本人被蔑视的一个原因。这也可能是中国人排日的原因之一。那些人也应该谨慎从事。”⁽²¹⁾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书院学生还是有一定的正义和同情心的年轻人，对中国百姓受到非礼表示同情。但是对排日问题的看法他们只是受自己的立场所限，停留在只看表面现象，忽视了中国人是在为争主权、争独立的深层诉求的问题上。

东北调查班没看到排日、抵制日货情况。“这可能是因为一般满洲人对日本在日清、日俄、日德战争等充分地了解了我们的实力，对日本佩服的结果，懂得不能排日。他们也曾一度抵制过日货，满洲铁路也曾经停运过一段。因此，中国人的生活更艰苦了，中国商人自己开始意识到要保护生活安定，一般中国人也明

⁽²¹⁾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 31 卷第 5 编

白了这种利害关系。”书院学生对东北情况如此幼稚的判断，说明他们对中国的实际国情还了解不深。

书院学生先后踏查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近百个调查点，与当地的官界、商界、学界、普通农民、妇女儿童接触，并在直观街景和人们交往过程中体察了解了一些当时中国民众对日的反应。总结出：越是交通方便，教育程度越高的地方排日、抵制日货越厉害。他们这一判断还是比较客观的。在调查开始前，他们十分担心此次调查能否成功。然而，事实上与出发前所担心的完全相反。他们亲身体会到当时中国各界人士对日本政府和青年学生是有不同反响。调查报告中总结说“中国人中属于旧知识阶层或官僚的大部分人都是亲日派，不是反日的。此次排日运动完全是学生和一部分商人所为，应该知道官界并没有因此而动摇。”⁽²²⁾不过书院学生在**兖州府**却遇到了冷遇，验证了他们去那以前传闻。所以他们判断该地官僚有排日情绪。在日本留学过的或与日本有过瓜葛的人，绝大多数对日本人都表现出热情好客，甚至有的显得有些殷勤。

书院学生对教育界人士，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怀疑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武汉**文华大学当局表示反对学生运动，书院学生则认为南京金陵大学是排日的根据地。可见当时教育界的学校管理层和教职员对学生运动态度，根据区域的不同，学校的不同还是有差异的。即使是“排日”的大学他们对书院学生的接待还是以礼相待，显得相当理智。

书院学生在济南想去齐鲁大学参观，被该校学生毫不留情地拒绝门外。此次参加调查的书院学生跟“五四运动”的主体人群——中国学生接触极少，他们斥责中国学生在其爱国美名下成为排日的急先锋。书院学生分析，由于学生提倡抵制日货运动，使商人受到损失。即使商人对日本人即使没有好感，也绝没有恶感。但是又认为商人中的一部分人是因受到学生的煽动才对日本产生了恶感。结论是一般民众特别是商人对日看法相当不好，很多人对日本人流露出不逊和冷淡态度。对商界人士的这一看法，可以看出书院学生还存在自相矛盾，对商界人士的对日态度琢磨不定。

本次在华调查报告书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和书院学生的“中国旅行日志”一样，较客观地记录着近代中国的经济、人文变化，是一部难得的宝贵史料。

笔者认为：书院学生观察中国人的“排日”现象时没有离开局内人的狭隘目光，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排日”“排货”现象。他们还是受当时日本国内的报纸报道影响，认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只是几个中国人因留日时受到过欺负，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以这种模糊的视觉观察运动的实质，是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从更深层思考中国人的“排日”“排货”原因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书院学生观察运动本质认知有误。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报告书对当时中国社会现象的客观记录的史料价值。

在报告书中记述了 95 年前，书院学生乘火车旅行的经过，充分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纯朴、热情好客。即使在那个年代，两国的国民之间还是友好和睦的。

⁽²²⁾ 东亚同文书院《第十三期支那调查报告书》第 31 卷第 5 编

调查报告书中几次日中两国人都提到应该进行两国的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必要性。

当下，中日两国的关系因对历史认识问题和岛屿争端等原因，两国关系很不和谐，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抬头。但是，把国与国争端问题放在一边的话，两国民间人士寻求相互友善仍是大势所趋。现在，每年到天津南开大学留学（参加现地教学项目）的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学生，在中国所遇到的情景，很多地方与 95 年前的情景相似。他们在中国上街或外出旅游，在南开大学校园里的生活同样受到了当地市民的以客相待和各方面的关照。两国青年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得到了加深。这一事实与日本有些媒体的报道内容大相径庭。在民间层面上，两国国民还是向往友好和友善的。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到当地留学的学生都会有亲身感受。我们从 95 年前的这一调查报告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希望以邻为善的心愿。